

在斗争的道路上

夏阳著

在 斗 爭 的 路 上

夏 阳 著

江蘇文藝出版社

內 容 提 要

這本書是以解放战争初期苏北局部地区的斗争为背景的长篇小说。1946年7月，国民党军队破坏和平，制造内战，向我苏北解放区进攻，我解放区军民被迫起而自卫，展开了极为激烈、复杂的武装斗争和政治斗争。这里所写的，还仅仅是斗争的一个片段，但是已经可以使我們窥见当时斗争的尖锐性和复杂性。在斗争的路上，人們受到了严峻的考驗和教育。坚定的更加坚定，曾經动摇的也终于走向了坚定。至于那些伪装的“开明士紳”，則在斗争中暴露了他們的真面目。

在 斗 爭 的 路 上

(修 改 本)

夏 阳 著

※

江苏省书刊出版业許可證出○●四号

江 蘇 文 藝 出 版 社 出 版

南 京 湖 南 路 十 一 号

江苏省新华书店发行 宁印刷厂印刷

※

开本 850×1168 1/32 印张 8 $\frac{15}{16}$ 字数 215,000

一九五九年三月第一版 一九五九年三月南京第二次印刷

印数 8,001—18,000

統一书号：10141·583

定 价：(6)九 角

在如皋城的东北四十五里有一个市镇，叫做李堡。当地有一句俗话说：“李堡人，生得苦，一跑就是四十五。”这是说：李堡人出外有事，往往要跑四十五里路：上如皋城固然是四十五里，向西偏南到海安镇也是四十五里；向东北到海边的弼港是四十五里，向西到富安向北到三仓又都是四十五里。按照旧的县治，李堡镇属如皋县的边区，从李堡向北，就是东台县的地界了。

在一九四一年，也就是苏北抗日民主根据地建立起来，日本鬼子占领了许多据点以后，旧的县治被敌人的封锁线分割成一块一块的，为了行政管理和抗日斗争的便利，李堡曾被划归临时的行政单位管辖。到了抗日胜利以后，李堡又划归以海安为中心的新设的县治管辖。以李堡为中心而建立区的行政单位，叫做李堡区。

属于李堡区有一个钱洋乡，在李堡镇西北六七里路的地方。钱洋乡有一片广阔的田野，当抗日战争结束了的时候，是一片平静的田野。

是一九四六年夏季的一天，西方的树丛上面，挂着一轮又红又圆又大的太阳，映出了半天的彩霞。但是，这个夏天的太阳已到了休息的时候，射出的光辉，却象疲劳的人一样无力了。

夕阳映照着田野，这景致是非常美丽的。远近的林木，分散的村庄，零零落落的农户，骑牛回家去的牧童，不同形式的牛车篷（有圆形的，有六角形的，有草的，有瓦的），还有田里长着的玉蜀黍、高粱、黄豆、稻子……这一切，反映着夕照的光辉。

在这钱洋乡境内，有一条自南向北的大路，一条从西向东的河流，交叉成一个十字形。在这十字的交叉口，正建筑成一座新的桥

樑。十几个工人在整理鋸子、斧头、木料、砖瓦等东西；他們正在准备收工回家。在这座新桥的下面，横放着一只破旧的、渗了半艙水的小船，船的两头各系着一根草繩，通到河的两岸；可以看出，在沒有新桥以前，就是由渡河的行人，自己拉着这只破船过渡的。

靠近桥北路西的地方，有一座凸出地面四五尺高的土墩，面积有三方丈多。墩子上有一座新建的六角亭子，是古式的，每个亭角都象水牛角一样尖尖的翘着；下面掛着銅鈴，随着风吹，鈴儿便叮叮噹噹的响起来了。亭子的柱子是紅漆的，四周矮牆上的短栏杆也是紅漆的。朝东的入口处掛着一面金黄色的横匾，上面是“百世流芳”四个黑色大字；左下角又有“錢洋乡羣众公建”等小字。亭子的正中豎着一座石碑，碑上有許多小字，标题是“抗战烈士紀念碑”。碑的反面，刻着牺牲的烈士的姓名。烈士包括两方面的：一种是因抗战而牺牲在錢洋乡的；一种是錢洋乡本地人，因抗战而在異乡牺牲的。

这时候，有一个三十多岁的人，正繞着这座石碑徘徊着。他，胖胖的圓圓的脸，长长的向后梳的头发，白淨面皮，中等以下的个子。穿着一件白府綢的西装衬衫，肩头上有一块整齐的补靛；領口敞开，露出里面穿着的汗衫。下面穿的是白洋布的褲子，光着脚，穿一双半旧的跑鞋。他嘴里念着正做好的詩句，还打算繼續做下去：

“遭受了八年的創伤，
而今，
获得休息的时候了，
我歌頌和平！
我歌頌和平——
正在
平靜清幽的夕照中間……”

他念着，想着，慢慢地踱着，偶然抬头看一看夕阳，重复地背诵着他所创作的诗句。

从桥口走来一个十六七岁的孩子，走到台阶上便站住了，笑着说：“哈哈！方先生一个人在这里唱歌吗？”这个被叫做方先生的回头一看，也笑着答道：

“哦！是你？李德宝！我不是唱歌，是做诗啦。做诗，你懂不懂？”

李德宝接口答道：“懂懂懂，我虽没有上过书房，倒也听见人家说过。我晓得你方先生是在做唐诗，是不是？‘熟读唐诗三百首，不会做诗也会偷。’方先生，你说我这话说得对不对？”他没有等到那个方先生回答，一步跳下平地，走到桥上去。他用不准确的发音唱着“烧那烧那驼那驼……”的调子，在桥上扭着秧歌舞。但是，马上又停下来说：“这座桥，骑脚踏车的人真便当，可以一飞而过。”

“只怕连汽车也好过哩！”有人这样应着说。“这座桥和以前差不多大。以前的桥上，黄狗就走过两次汽车，我记得，来破坏这座桥的时候也有我在内。”这里的人们大都把日本鬼子叫“黄狗”。

李德宝回忆着说：“我也来的，那时我才十四五岁。”这个李德宝是农家的孩子，皮肤晒得黑黑的，披着一件破了好几处的短衫，穿一条黑短裤，光着大半条腿，赤着脚。他虽然是瘦瘦的，但却长得结实。一头乱蓬蓬的头发，上面洒盖着灰尘。他一面说话，一面走过桥去，拿起一根扁担，打算回家去。这时，看到前面过来一个人，便迎上去喊着说：“蒋乡长，你看，新桥已经完全弄起来了。”

那个被叫做蒋乡长的随口答应道：“全成功了么？你在这里做什么的？”

李德宝得意地说：“我吗？做小工的。以前打鬼子时候破坏这座桥有我，现在和平时修这座桥也有我。”他的神气显着很骄傲，

但蔣鄉長沒有注意他，就走上橋來，仔細地察看橋身，似乎覺得很滿意，自言自語地說：“又建築好一件東西了。”

有些整理東西的工人還沒有走，跟着問道：“蔣鄉長，怎麼樣？還合適吧？”

蔣鄉長點着頭答應說：“不錯，不錯。”

蔣鄉長是一個三十多歲的壯年人，中等身材，瘦長臉，眉毛又寬又濃，是個很健康的人。穿着一身灰白色的短褂褲，頸項里的鈕子解開着；戴一頂寬邊的大草帽。腳面上布滿着厚厚的灰塵，幾乎使腳面與舊單鞋分不出界限。那個方先生發現了他，便由亭子里走下，也向橋上來了，而他卻先喊道：“方先生也到這裡來玩的嗎？”

方先生連忙答道：“啊，鄉長！我是去看學校砌得怎麼樣的，路過此地，就在烈士亭上玩了一會。”

蔣鄉長問：“學校砌得怎麼樣了？”

方先生說：“已經完成了六間屋，還有三間正在蓋瓦，也快完成了。”

李德寶扶住扁擔看着他們談話，他們並沒有注意。蔣鄉長又說：“等開學以後，學生增加了，再砌起六間屋來，你看怎麼樣？”

方先生又是稱讚又是奉承地說：“那好極了！現在和平時期，鄉長對本鄉的各種建設很有功勞，真正領導有方。烈士亭砌好了，橋又造好了，學校又建築好了——你看，這座橋造得很不壞。”

蔣鄉長聽了這些話很高興，繼續說：“現在是和平建國時期，行政上再不建設一些東西，做什麼工作呢？……什麼時候我也要到學校里去看看。——你看這座烈士亭做得怎麼樣？是鄉里現成料子，並沒有多花經費。”

方先生夸讚說：“很好，很好，又漂亮，又大方。人說‘破壞容易建設難’，我看，建設有了你鄉長領導，也就不難了。”

“那里，那里。”蒋乡长表示谦虚地说。他并且指着亭子说：“这个门口，缺少一副对子，这是一个大缺点，有工夫还要想法子加起来……。”

这个方先生是一个小学教师，名叫方振亚，一般人都称呼他方先生。虽在錢洋乡小学当教师，並不是錢洋乡人，可是也住得不远，就在邻乡。现在他看看太阳已經缺掉了大半个，談了几句，便走开要回家去了。李德宝一直呆呆地看着他們談話，见他們散了，便也走开。但是在刚刚散开的时候，方振亚走了几步又喊住蒋乡长，李德宝也又站了下来，方振亚問道：“目前时局如何？有沒有新的变化？”

“什么变化？”蒋乡长反問着，然后答道：“和平是确定了的，不管怎么样，国际国内总是一个和平形势。”

方振亚又問：“会不会发生第三次世界大战呢？”

蒋乡长肯定地摇头說：“不会，不会，德国和日本都垮了台，还有那个敢发动第三次大战？放心，不会的。”

他們分手之后，夕阳已完全沉沒到地下去了。

蒋乡长向北走着，忽忽忙忙地要赶到乡政府去。

蒋乡长的名字叫做蒋全，他担任錢洋乡的乡长已經有两年的历史了。他是一个讀过二三年書的貧苦的佃农，在建設苏北抗日民主根据地的过程中，他参加了民兵，以后便做了村长，再后便提升为乡长了。几年的工作，使他增加了知識，提高了办事能力，生活和做事的作風也改变了不少。只要看他衣袋上插着一枝新民牌的自来水笔，口袋里放着精装的筆記簿子……这些，就不是一般农民的样子了。

蒋全沒有留意黃昏的景色，只顧眼睛看着路，快步地走着，走着。正从一处三叉路口，轉弯向西，迎面走过来两个女的：年紀相差不多，不过二十来岁上下，一看就很容易的分別出剪了短发的是

姑娘，留着发髻的是大娘。那个姑娘走在前面，年紀当然比較輕一点，額上一批刘海儿，复到眉毛，瘦长脸儿，她带着满脸快乐的笑容，远远的就喊起来說：“啊呀！蔣乡长，到那里忙呀？”蔣全也已看到她們，接着答道：“好，正要找你妇女会长。现在上面又介紹来一位复員軍人，叫做叶大荣。我們要帮他成家立业，分田給他，分配房子給他住，还應該給他介紹一个对象。这一次，又要劳神你这位妇女会长了……”他把“妇女会长”四个字說得特別高而慢，好象是在开玩笑。那个被称为妇女会长的姑娘听了，心里又高兴又有些难为情，便插嘴說：“你叫我王友貞，我不要你叫妇女会长，好叫不好听的。……”这时他們已經走到一起来了。

蔣全笑着說：“哪，哪，哪，不要卖俏。晓得你家了不起，妹妹当乡妇女会长，哥哥当民兵指导員，一家就有两个乡級干部。——不，我們还是說正經話吧。我說的这个复員的叶同志，原来也是本乡人，出去四五年，当过排长，現在我們負責分田給他，安插他房子住，你們妇女会也一定要負責帮他成家立业。他虽是本乡人，却是光桿子一个人。對於复員軍人，我們都要照顧周到，何况这个叶大荣还是一个軍事干部。”

王友貞听說是本乡人，自己已經想了一想，从来沒有听说过这个名字，便問：“那一个叶大荣？我怎么不認得？”

蔣全說：“你怎么会認識？連我也还不認識哩！人家可是老革命了。四五年前，叶大荣就参加部队，出去革命，那时候我們还不不懂革命是什么一回事呀！他出去时，在錢震家里当伙計，无家无室。新四軍才到我們这一带，他就自动參軍去了。所以以后我們做“优抗”工作，也沒有做到他，当然記不起有这个人了。象你妇女会长，哈哈，那时候还是光赤膊的十几岁的毛丫头啦……”他說着便大笑起来。

王友貞被說得不好意思，尖着嘴笑罵說：“呸！还輪不到你来

做寿星老儿卖媽媽，倚老卖老。”

蔣全停止了笑，接着說：“好好好，是我說得不好。說正經的，这样一个革命同志回来了，我們当然要好好优待，你总不能推卸責任。我給你看区政府的介紹信。”他从口袋里摸出一封信来，交給王友貞。

王友貞識字不多，她把信馬馬虎虎看了一下，黃昏中更看不清楚，便又交还了乡长，說：“妇女工作可不大容易做！不过，只要是任务，我們总会完成，上次那个孙胜同志要成家，我們妇女会不是替他办到这件事情了嗎？抗日打鬼子光荣，这个道理是个个人都晓得的，可是你不晓得有些妇女多落后，……”

蔣全哈哈地笑着說：“会长同志，这回子又看你的了。你一向任务完成得好，我全知道，这回一定也完成得快。孙胜是一条腿的荣誉軍人，而且又是江南人，本地人不懂他的話，也能成家立业。至於叶大荣却是复員軍人。又是本乡人，这工作應該容易些，是不是？你說，指导員太太！”他忽然轉向那个一直沒有开口，看着他們說話的大娘問。这就是王友貞的嫂子，她的名字，早被忘了，人家称呼她“大嫂子”或者“王大嫂”。她听到乡长称呼她“指导員太太”，知道是打趣她，也便笑着說：“蔣乡长，我看你倒象疯狗一样，乱咬一頓。我站在这里並沒有撩你呀。”

蔣全还是笑着說：“啊呀，王大嫂，我並沒有得罪你老人家，你怎么不听奉承的？好好，又算是我不好。”他依旧轉向王友貞說：“我还有事情去，叶大荣的这件事情就交給你負責。”

王友貞說：“这个，我看也不好着急，不能当做突击工作做。要找对象，也不能随随便便，談好了，还要讓人家两相情願才行。等我把这个叶同志的根本底細查点清楚了，就来想法子。不过……”她向蔣全走近了一步，看了一眼东西两面沒有人走过，便低声問道：

“你知道现在时事怎么样？究竟会不会打內战？我們这里还在复

員哩。聽說这块地方的新四軍和干部要撤到东北去。我想，內战也可能有內战，只是撤退恐怕一定不会的，但是我家父偏偏相信那些不三不四的謠言，催着我們去查点我哥哥的事情，我們就是才去查点回来的。”

王大嫂这时也接上来問道：“乡长，你說友祥受訓过后，会不会回来？”她比王友貞的身材要高一点，呆板地站着，等蔣全的答复。

蔣全把闊边草帽从头上推下去，背在背后，激动地說：“我劝你們什么謠言也不要听，都是放屁。謠言不管怎么样，眼前的复員总是真的。现在是和平的时局，不然，我們主力部队为什么要复員？內战，沒有这句话；撤退上东北，更是謠言，这都是胡說八道，根本没有这回事。”

王友貞向前跳了一步，又大步跨回头，一面說：“謠言是謠言，但也不会‘无影造西厢’，平空地說起来，总要能追出这个謠言的来由。”王大嫂跟着說：“这就不錯啊，‘狗不咬空声’，总看见一个东西才咬哩！”她还是呆板地站着。

蔣全象是在会上演講一样地向她們解釋說：“地主封建坏蛋連狗也不如，一心想‘老中央’，有得沒得的造謠，我認为他們就是咬的空声。新四軍要走，要撤退，这种話我已經聽說过几年。新四軍不但沒有走，而且越过越多。一九四〇年新四軍东进建立根据地，黄桥一战，頑固派被打得落花流水，地主却造謠說要調风了，东风刮过了要刮西风。还说‘中央軍’有三十万大軍要开到苏北，那时候連我也吓得不敢出头，只想安分守己做个老百姓，还不是上了当嗎？现在怎么样？我参加了几年革命工作，新四軍不但沒有撤退，而且进了步了。日本鬼子也投降了，国内也和平了。我就看这个道理，所以我說，謠言是不能听的。”

王友貞接着道：“我家父却偏偏相信，还逼着我大嫂子找我哥哥去。我向他說了又講，講了又說，就是不信我的話。他說起来，

理由也象是不少，弄得我自己也将信将疑，有些糊涂起来。本来我告訴他們，我哥哥到县里去受一个月的訓練就回来，果真有什么情况，他还不比我們听得早，馬上就会回来的。但是他們却听謠言說，訓練班要先調到东北去；‘中央軍’馬上要來，他們害怕得很。”

蔣全又詳細地講解說：“要來？好容易！說了几年了。去年毛主席上重慶去，也說我們苏北要撤退了。錢本余去年和人賭东道，說新四軍能在这里过八月中秋，他就杀下头來。嘿！倒要杀他的头才行。等到过了中秋节，又說‘中央軍’要来过阳历年；过年时怎么样？还不是我們提灯遊行，大大地熱鬧了一陣子。现在过了年又过下来大半年了。走，走，走，这些傢伙一天到晚做梦也想新四軍走，巴望‘中央軍’，他們是什么立场？我們是什么立场？他們的話那里能听？你回去再說服你家父，就把我这一番話說一下也行，教他放心，我有空也去說服他。王大嫂也不要跟着听謠言才好。”他說着便把眼睛看着王大嫂，向她說：“大嫂子，他們年紀大的人是死脑筋，不开通，你也真去找王友祥回来嗎？不是我不客气地批評你一下，丈夫是民兵指導員，姑子是乡妇女会长，你也不能不进步。你这次如果追到县里去拖尾巴，真难为情呢！不但自己丢脸，叫王友祥也不能见人。你放心，我保證你丈夫王友祥少不了，一个月訓練，毕了业就回来。我說呀，他受訓也不止一次了，以前抗战时期最长还受过三个月的訓，现在和平了，不过在海安，离家三四十里路，日期又短，怎么反而而不放心起来了。——我說，大嫂子，你也不要为私人心急，这几天还等不得嗎？到底年紀輕，哈哈！”他隨即大笑起来。

“伤德的，你总沒有好話說，拿人家老实人开心。”王友貞做一个要打蔣全一巴掌的姿勢，蔣全笑着讓开了一步。

王大嫂却是沉默着不說話，她把蔣乡长的話句句听在心里，觉得的确有道理；但是，又以为这总是当干部的說的話，恐怕是一面

之辭。因而她总觉得有些不放心。他以为在乡里做工作是不要紧的，到区里开十天八天会也没有什么問題。现在到了县里去，嘴上說是一个月，如果調走了，家里晓也不晓得，又到那里找去？——她这样想着。

一陣烏鴉从他們头上飞过去，黑黑地遮住了一块天，哑哑乱叫着。王大嫂向四面看了一眼，好些人家烟囱里正升散着炊烟，她於是說：“时候不早了，还要回去烧晚飯啊。”

蔣全也說：“对，說話忘了时辰，我还要赶到乡政府去。”他点点头，便忽忽向西走去，王家姑嫂也就回家去了。

二

地主錢震，原来有一百多亩的收租田，經過土地改革以后，分到了二十亩田。在錢洋乡，比他田多的地主都已經逃亡出去了，但是他沒有走。因为他騙得了“思想进步”、“开明士紳”的美名，他自認為在民主政府里是吃得开的。

他是一个旧制中学的毕业生，已經四十余岁了。矮个子，使他显得很胖。和尚头，有一双神气的眼睛，看人的时候，眼光逼得人家不敢正視他。自土地改革以后，他自己到处宣传說要下决心吃苦，並且已亲自学习起种田的活計来了。

他平时与乡里的干部們很接近，时常到乡級干部家里去走动走动，問长問短，打听时事消息，或者借几本書几份报纸看看。在口头上，他的确是拥护共产党的政策的，比如對於土地改革，他就一再地在人們面前說：“土地改革是世界的潮流，那一个能反对？就是站在地主立场上講話，凭你几个地主就能反对得掉嗎？耕者有其田，合乎天理、国法、人情。我现在也分了田，只要自己不再享乐主义，决心劳动，还愁沒飯吃，沒衣穿？还愁不能生活？共产党要人人有飯吃，有衣穿，这种政策再好也沒有。所以我錢震，虽不說怎样开明，但是总要跟着共产党走，遵守民主政府法令……”

这一天，太阳西下的时候，他背着手，一步一踱地走到王大元家的門口来了。

他穿一件白府綢的旧短衣，里面衬着旧汗衫。下面穿一条黑色香云紗的褲子，也是旧的。脚上沒有袜子，穿一双皮鞋。手上拿着一把紙折扇。到了王大元家門口，問道：“你家指导員回来了嗎？”他打开扇子搨着，显出扇子上一面画的山水，一面写的篆字。

虽然穿的、用的都是旧的东西，却依然不减那种地主身分、紳士派头。

新修理的草屋面前有一块不大的场地，场东头堆着两个草堆，西头一个塘，是积灰粪的，塘南头的地上钉着一根木桩，桩上扣着一条黄牛。王大元一看见錢震到了，連声喊道：“三先生，三先生。”同时，急急忙忙地走进屋里去，端出一张长凳，放在門外的场上，招呼說：“請坐，三先生，門外场上干淨风凉些。”他是一个靠近五十岁的农民，种田过了一生，是一个安分守己的忠厚人。和尚头，稀稀的短胡子，穿一身半新的蓝夏布褂褲，赤脚穿一双草鞋。从前他称呼錢震叫“三少爷”、“三老爷”，“三先生”却是新四軍来了以后改的称呼。他又回答錢震的問話說：“到县里去已經六七天，說是要訓練一个多月。听說现在时局和平了，凡是当干部的都要到县里輪流訓練訓練。不过，又听說和不起来，还要打仗。三先生，你看时局怎么样？可和得成呢？你有没有听到什么风声呀？”

王大元看着錢震，等他的回答。錢震慢慢地坐到凳子上，一面說：“我正想来查点查点指导員，眼下有些什么消息。你看，这些时飞机飞来飞去，一天几次，我看不象好兆头，有些不放心的，也不晓得这些飞机是那一个的。王大爹，你說共产党有沒有飞机？这个，你家指导員一定要和你談的。要是共产党也有飞机，就不怕国民党进攻了。”

王大元帶着一些抱怨的口气說：“我那里晓得这些事，他真难得有工夫和我談！——不过，你們常常看报，总要比我晓得多些。我是不識字的睜眼睛子，別人不告訴我，我是什么也不懂的。这些时我也有些不放心，飞机天天飞，听說外面风声也不好。三先生，你究竟有沒有听到什么风声呢？”

“风声，你还問我嗎？”錢震放低了声音慢慢地說：“我听到的也不知确不确，因为不放心，才到你家来問你。有些人傳說要調

风，說是‘中央軍’馬上要到，不知是真是假。据說这次並不要打仗，国、共两党已經談判好了，新四軍交出苏北，退到山东去。新四軍不敢不答应，假使不答应，国民党有美国帮忙，单是飞机上放一个‘肉气炮’，一炸就是六十里方圓，鷄犬不留。”他慢吞吞地搖着头，加重語气重复說：“鷄犬不留，鷄犬不留。”

王大元驚訝着皺起眉头說：“啊呀，这样厉害？这些洋鬼子真坏，亏他怎么想得出这个‘肉气炮’的？”

錢震趁势又吓他說：“厉害，厉害！这个‘肉气炮’也有个洋名字，叫做原子弹，懂不懂？原子弹。所以新四軍非退走不可。”

王大元点点头：“噢！”

錢震停頓了一下，又問：“如果你家指導員撤退上山东去，你們一家是不是全跟了走呢？——啊呀！山东真是苦地方，比不得我們这里舒服。山东人又穷又俚又兇，你看，过去在我們这一带当兵的，还不都是山东人，十个中难有半个好人。所以俗語才說：‘好鉄不打釘，好人不当兵’。啊，那种地方不是人住的……”他不住地搖着头。

王大元沉默着，长长地叹了一口气：“唉！……”

錢震站了起来，另換了打招呼的口气說：“你不要听了我的話就心事重起来，我这句话不能算数，人家怎么說，我也就跟着怎么說，你不要馬上信以为真。不然，惹他們当干部的听起来，我这个入就是造謠，就是頑固分子，那我就吃不消了。”

王大元声明說：“說不到，說不到，你的話我不会在干部面前提的，你放心。我也不只听了你一个人說，有的說‘中央軍’馬上就要来，已經各事預备好了，就等老蔣的命令。还說我家友祥也要調上东北去。我真不放心，打算要我媳妇明天到县里去，把他找回来。”

錢震順水推舟地說：“那很好，当干部最好在本乡，去远了就难

說几时回来了。”

王大元又反問道：“三先生，你可曾听說‘中央軍’来了，对待干部的怎么說法？‘地头无鬼不生災’，‘中央軍’對於我們乡下不知底細，有人說怕就怕还乡团。有許多人販猪子上南通，說是这里逃亡出去的人，都进了还乡团；还乡团还带信回来，說是馬上带‘中央軍’来还乡了。”

錢震說：“是啊，这句话不錯，是有这么一回事。你知道錢本余今天夜里也逃亡上南通去了。有人說，他也去进还乡团了。”

王大元已經在忧虑着，听了这话，更带着一种惊慌而又不解的神气問道：“他們干部不是对他宽大嗎？他勾結‘和平軍’，惩奸时沒有办他重罪，还又分了田給他，教他安分守己在家种田，为什么逃上南通呢？逃开了家乡又去当还乡团鬧还乡，这是何苦？”

錢震冷言冷語地說：“他的目的不是为了还乡，恐怕要对干部报仇的吧！”这个回答正打中了王大元的心窝。王大元心里，正在盘算这个对他不利的坏消息。錢本余是被他的儿子領導羣众作为汉奸斗争过的，如果回来，怎么办呢？一定要报复的。虽然另外也得罪过不少逃亡当还乡团的人，惟有錢本余逃得最迟，也对本乡的情形最了解。这个人是什么事情都干得出来的。於是他后悔以前惩奸时为什么沒有把他枪毙掉；他又怨恨起民主政府的宽大政策来，認為不是民主政府說什么宽大政策，这个人早已被老百姓杀掉了。对这种人宽大，就是害了別人——他这样怔怔地想着。錢震又說：“报仇，这大概是一定的。听說他这次也是被逼得没法才走的。本来，还乡团里带了多少信来喊他去，他总沒有答应。在乡里生活得很好，时局又和平了，何必跑出去再来还乡呢？听說是这一次蔣乡长把他喊了去，拍桌子发脾气，当着許多人罵了一頓。說是：‘现在听說你不安分，造謠言，还望“中央軍”来；又和还乡团勾勾搭搭。“中央軍”来就来，老子准备被杀头。哼！当我沒有被杀的时